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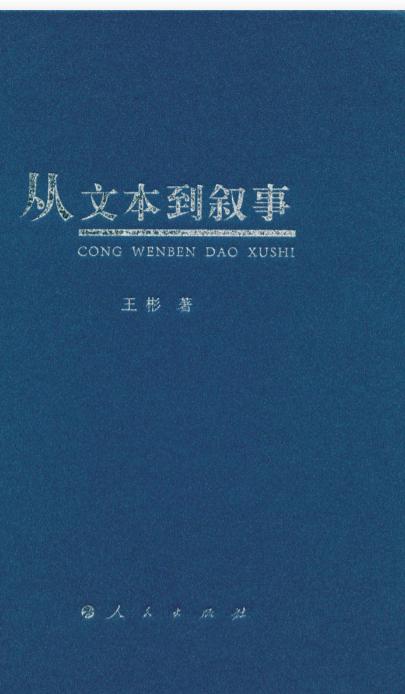
书 评

融会贯通式的叙事研究

□何向阳

《从文本到叙事》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该书是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项目的一项成果。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从2004年开始启动,至今已经14年了,有1000多部项目获得资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等,其中理论一项是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在这些理论评论扶持项目中,专著更是少而精,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就是其中一部。

王彬在这部书中,治学态度严谨从容,因袭了他在鲁迅文学院教书育人的学者风范。文章不写一句空,引文观点都有来处。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行文又非常从容,娓娓道来,一派儒雅之风,而非紧张的、焦灼的、剑拔弩张式的写作,行文始终呈现出一种学者状态。他以一种非常从容的心态对待研究,带着学者的优雅与讲古的耐心,专著的面貌也因之呈现出一种古典性,而且对于治学的阐述,多是从文本、叙事与细节出发。此前许多理论书很容易写成高头讲章式的,作者浮躁地对待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或者拿着西方的一些理论套进来,其实就是两层皮。但《从文本到叙事》一书,则是王彬坐冷板凳得来的,从准备到写作长达16年之久,最后成书20万字,非常扎实。我们在文学理论当中倡导“讲格调”、



作品的叙事中、从《水浒传》的叙事中,一点一滴地做着提炼,让那些史册古籍中被尘封的文字焕发出新的生命。

该书还是一种有文化性灵的写作。叙事学是一种西方学术理论,这种外来的理论如何同本土话语融合,是一种学术上的挑战。例如在古典文学当中,能否找到某种对接,而

“讲品位”、“讲责任”,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必须落实到文学写作与理论研究中去的,这一点在《从文本到叙事》中都有所体现,让读者不禁心存敬意。

《从文本到叙事》作为理论专著,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种学术趣味于其中。许多学术书为何让人打不起精神?就是它有一种僵硬感,没有生趣,更谈不上生机。但是王彬在该书中一方面保持严谨,另一方面也讲趣味性,他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经典文学当中的一些细节呈现出来,这也是作者本人一以贯之的风格。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从文本到叙事》一书恰是从学术的角度让这些压在古籍中的文化活起来的一种努力,作者从《红楼梦》的叙事中、从鲁迅

非生硬地拿来;再如在讲中国故事时,怎样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提升与补充。在这方面,《从文本到叙事》做到了一种超越,一种融会贯通,作者将西学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与本土化的文本与叙事相融合,完成了西方学术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我们现代的文艺理论,在80年代之后,更多地是“拿来”,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原创力相比于“拿来”而言还是不够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把这种叙事学、心理学等学科中人类最先进的学术成果与我们的文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框架、新的理论、新的言说,也就是说形成中国的本土话语,确实是一代学人的文化责任。而把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部分,进行现代的解读和阐释,就更是代学人的使命。

以上三点,一个治学态度,一个学术趣味,一个文化性灵。尤其是第三点,这部著作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灵,它不是拿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它不是生硬的、生吞活剥式的,它是一种融会贯通式的,它有着本土文化的深深烙印。这三点是我拜读这部书的突出印象。此外,本书的附录中收录有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论文,也是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他从鲁迅先生的25部小说中总结提炼出有13部是第一人称写作,并把叙述姿态和叙述身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较,这种从第一人称出发来研究鲁迅本身,亦有浓厚的学术趣味充盈其中。这种学术趣味不是那种为有趣而有趣的戏说,而是一种有较高的学术含量的智慧结晶。这部书还提出了“漫溢话语”、“作家的场”等概念,这些在融会贯通式的研究之上而出现的自己的新的学术语言更为难得。

(《从文本到叙事》,王彬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历史创伤的浮现与现实撕裂的挣扎

□ 杨毅

作家石一枫近年来备受关注,在逐渐告别了早期伤感倦怠的青春书写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社会现实的书写中来。在以《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石一枫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题材,直面社会现实,介入当下生活,建立起文学与社会的有效联系。新书《特别能战斗》延续了作家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且试图将当下现实与过往历史相连,进而探寻两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书中收录的两个中篇近作——《特别能战斗》和《营救麦克黄》,写的依旧是作家熟悉的当下北京城市的生活。尽管作家一直秉承着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但作家书写城市,并没有浮光掠影般地将城市作为“罪恶之源”或“欲望之都”,而是为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赋予了别样意义。在石一枫的笔下,偌大的北京城充斥着各色人等——有“特别能战斗”的大妈、“嗜狗如命”的公司白领、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外来务工者,更有因没钱看病而坐以待毙的无辜受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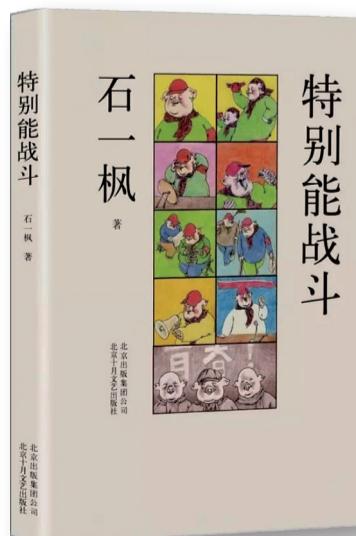
在《营救麦克黄》中,我们看到阶层之间的壁垒的牢固与无情。以公司高管黄蔚妮、报社主任尹珂东、“富二代”徐耀斌为代表的有钱人,不仅主宰着颜小莉等底层员工的命运,也决定着整个故事的走向——尽管颜小莉想要通过“虐狗”来挽回局面,但还是免不了束手就擒的结局。

然而在小说中,掌握资源的人却并没有与之相配的良心。黄蔚妮可以因为自己的宠物狗,而致他人的生命于不顾;尹珂东则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同样对此冷漠。与之相反,颜小莉却一直生活在良心的谴责与恐惧之中。但要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将之处理成道德谴责的故事,而是呈现出不同人物之间的复杂矛盾。在这里,黄蔚妮信奉的合理性法则与颜小莉坚持的合情性规则产生了冲突:一方面是黄蔚妮不允许自己陷入负面境地,另一方面是颜小莉笃定的人命关天。也正是她们无法调和的冲突才把这篇小说推向失控的边缘。

如果说《营救麦克黄》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现实中的北京风物,那么另一篇《特别能战斗》则是作家深入到整个民族所固有的文化沉疴中,书写现实生活。

这种民族所固有的文化沉疴,集中体现在主人公苗秀华的身上。正如小说题目所揭示的,“特别能战斗”形容的正是苗秀华的最大特点。“战斗英雄”苗秀华在工厂上班时,和单位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作斗争;退休后,又带领小区业主和唯利是图的物业公司作斗争。在作家幽默的笔下,苗秀华的“战斗史”颇为精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别能战斗”的苗秀华可谓“民主的斗士”。但转念一想,“没人天生爱战斗,就连苗秀华的战斗也是被生活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只有当通过“正常”渠道无法捍卫自身利益时,人们才会使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才是“战斗”的独特意义所在。事实上,如果苗秀华不和单位领导“大闹”,那么她的合理诉求就无法表达;如果不是她义无反顾地和物业公司作斗争,那么小区业主的正当利益也就同样无法保证。

然而,仅看到促成“战斗”的现实因素却还不够。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家为“战斗”赋予了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意义。这时候,“战斗”又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惯用语。苗秀华在“文革”年代的特殊遭遇,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她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根据小说的交代,在“文革”时期,苗秀华一家被欺负,全靠她出头。“可她一个女人,又不是官又不是商,想出头拿什么出啊,只有吵、打、战斗……”由此看来,苗秀华的“战斗”乃是历史创伤的浮现,更是特殊历史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吊诡的是,这种“后遗症”也间接使得苗秀华从“民主的斗士”变成“权力的奴隶”。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在“革命”胜利之后,作为业委会主任的苗秀华,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迷恋和专断才开始暴露。而她这种专断的行为最终引起广大业主的不满,她本人甚至众叛亲离。

在石一枫这里,现实的撕裂勾连着历史的创伤。我们更应思考的是,夹杂在两者之间的个体,裹挟着记忆的伤痕,又该如何存在呢?

特别能战斗
石一枫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